

铁托在班达拉奈克夫人招待各国团长的宴会上致词说

任何威胁或压力都不能削弱不结盟国家团结

【南通社科伦坡八月十六日电】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今晚在这里设宴招待出席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在斯里兰卡总理致祝酒词后，铁托总统代表出席宴会的不结盟国家领导人致了答词。

铁托总统说：着重指出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为增进不结盟政策、为发展国际合作以及在使友好的斯里兰卡朝着进步方向过渡方面所作出的特别巨大的贡献，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

我荣幸地代表在座的各国代表团团长讲话，感到非常高兴。我明白，这是因为我不结盟政策的发起人之一。不幸的是，不结盟政策的多数发起人现在已不再活在我们的中间。虽然失去这些人，但是我有理由感到骄傲的是，同这些名字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项伟大工作已发展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正在出席的这个会议是再好不过地证明这一点，这个会议是友谊

和坚持为我们的目标奋斗的决心的宏伟体现。

在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上，我们曾经不得不克服了各种障碍，经受了許多考验。未能理解我们的人为数不少，不想理解我们的人就更多了。当然，这是因为不结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感到不安。不幸的是，甚至在今天，情况也是如此。在我们正在举行这个会议的此时此刻，许多属于我们的运动的国家正在遭受更大的攻击和压力。实际上，有一些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因为这一点而未能来这里同我们一起开会。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任何威胁或压力都不能削弱我们的团结，不能削弱我们在有关争取和平、独立和进步的斗争问题上的观点一致。恰恰相反，这会进一步加强我们的队伍和我们采取联合行动的能力。

我相信，在这次会议上，将为进一步更加顺利地实现我们面前的目标取得一致意见。

【南通社科伦坡八月十六日电】今天，即

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第一天，铁托总统的政治活动仍然十分活跃。

自从南斯拉夫总统三天前到达斯里兰卡首都以来，他会见了将近二十名率领本国代表团前来科伦坡参加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国家首脑或其他高级官员。

鲁巴伊说不结盟运动是个富有战斗性的运动

【本刊讯】亚丁八月十五日消息：民主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阿里十五日离开亚丁，前往科伦坡参加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

斯报报道斯总理将受托向联大呼吁执行关于印度洋和平区的决议

【法新社科伦坡八月十四日电】锡兰《每日新闻》星期六（十四日）写道：

“预料，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下月将在纽约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不结盟国家科伦坡最高级会议的一项委托，呼吁这个世界机构执行斯里兰卡提出的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联合国决

鲁巴伊主席行前对亚丁通讯社记者发表了一项声明。他说：“民主也门认为，不结盟运动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运动，它对我们的世界发生的一切不是采取消极的立场，而是一支站在为争取解放和进步，并为创造良好而合适的环境而进行斗争的人们一边的强大力量。而这种环境则是通过发挥不结盟运动的更加伟大的作用和加强同进步的民族和国家的团结，以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世界帝国主义的种种阴谋等途径来鼓舞各国人民的斗志所必需的。”

据该报说：“外交人士说，这一委托反映了不结盟国家的深刻不安，他们担心在印度支那的旷日持久的解放斗争取得胜利后，大国对抗的中心可能从东南亚转到南亚。因此，大国争夺海洋霸权的斗争可能加剧印度洋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时事社东京八月十六日电】题：北京七百万居民返回住宅

中国当局十五日深夜说“北京地区不大可能发生强烈的余震”。这事实上是解除了地震警报。自七月二十八日以来，在公园和街头过着帐篷生活的七百万居民，十六日早晨开始拆除临时搭起的窝棚，准备回家。

这一天北京居民喜气洋洋，充满了活力。

另外，在各国大使馆内避难的外国人，也开始回到建国门外和三里屯等地的公寓。

【法新社北京八月十六日电】今天一早广播车驶过大街，指示北京居民可以回家。数百万人民开始拆掉他们在大街上和空地上搭起的临时帐篷，自从七月二十八日地震以来他们一直住在这些帐篷里。

居民们有纪律地静静地听着关于搬回家住的指示。

数以千计的小窝棚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被拆掉了。搭棚子用的材料被运走了，人行道上与地震前一样洁净。

人们自己动手加固成一间真正的小房子的帐篷只要一小时就拆掉了。

仅用一上午时间就把数千米长的人行道清除干净了。最先恢复正常的街道之一是长安街。

人们用肩或者手推车把床和其它家具运回附近的房子里。人们细心地把棚顶上盖的塑料布或油毡卷起来送回到他们所借的地方。

所有搭棚子用的材料，都象它们出现时一样奇迹般地消失了。

在拆除一个帐篷后，帐篷的主人离开前总是仔细地把手行道打扫一遍，把地上所有的坑都填起来，并把垃圾清除掉。

为数不多的人将继续住在他们的帐篷或窝棚里，因为他们所住的公寓或房子由于受到地震破坏被宣布是不安全的。这些房子有的要修理，有的要拆除。拆除房屋的工作上周已经开始。

时事社报道《北京七百万居民返回住宅》

【路透社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八月十六日电】共和党选举该党总统候选人的代表大会，今天在爱国歌曲和诗歌声中开幕，这是预料会在福特总统和向他挑战的里根之间开展一场激烈的争夺战的序曲。

这两位竞争者于昨天到达这里，但是没有到会议大厅去，他们还在同各州的代表团进行会晤，看看能否找到他们认为能够保证自己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最后那几票。

大多数民意测验都认为，福特将在同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为争取州代表的一千一百三十张选票的竞赛中稍稍领先，这个数字是当选所必需的选票数目。

但是调查材料都把民主党参加十一月份大选的候选人吉·卡特的名字放在这两个人的前面。

里根的支持者正在为争取选票作最后的努力，他们准备在必要时要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要求福特总统在投票开始之前提出他的副总统人选。里根相信如果他能设法让总统提出他的竞选伙伴，他就能赢得那些原来支持福特但是不满意他的副总统人选的人的选票。

许多共和党人于周末私下会晤时清楚地表示，福特和里根的激烈竞争有可能将使共和党在

今后多年中都受到损害。

有些人希望在星期三晚间举行第一次投票时就能把总统候选人确定下来。要不然，代表们在以后的投票中就可以不受他们原先对某一个候选人所作保证的约束了，共和党人担心那样一来就会出现百年禁忌地激烈争夺选票的疯狂局面。

共和党的一位战略家对该党人员说：“如果在代表大会上出现一场争夺，人们要到两年之后才会真正感到这次大会的影响。”

第一次会议的最重大事件是福特夫人贝蒂和总统的其他家属意外地出现在来宾席上。

代表大会的实际工作是在西城其他地方的各委员会会议室中秘密进行的。

今天发表了福特接见《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说，他仍然在考虑把约翰·康纳利列为他的副总统人选之一。

如果挑选这位前得克萨斯州州长为副总统，那会使许多保守派人士感到满意，并会加强福特在南方各州的地位。

【合众国际社堪萨斯城八月十六日电】共和

美共和党代表大会在堪萨斯城开幕

福特和里根为争夺总统候选人提名展开激烈斗争

党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始正式工作。但是真正的活动是在幕后进行的——福特总统和里根都设法在幕后获得他们夺取党的总统提名所必需的另外的票数。

在提名问题见分晓之前，福特和里根不打算到这个通常用来进行篮球和曲棍球比赛的蓝色大厅。

相反的，他们两人各自安排同他们希望在选举之前拉到他们一边的代表进行会谈。福特的子女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在一些同代表举行的会议上代表他们的父亲。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另外一个未知因素是纽约州保守党人、参议员巴克利。巴克利在星期日晚上到达堪萨斯城时说，他还没有决定是否让他的名字列入争夺总统提名的名单上。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可能从福特和里根那里拉走选票，从而使两人在第一次选举中都不能获胜。

然而，巴克利十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决定不竞选总统提名。

巴克利说：“我不是候选人，我来这里是要声明我不当美国总统候选人。”

巴克利说：“我的动机是要使党团结起来。支持一位最强有力的候选人，以便在今秋对付吉米·卡特。”

刘易斯专稿《欧洲冷静地看待美国选举》

说西欧对美国选举漠不关心是因为各国全神贯注于国内政治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八月十二日刊登弗·刘易斯从巴黎专发的一篇新闻分析，标题为《欧洲冷静地看待美国选举》，摘要如下：

西欧一直在以不寻常的冷静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看待美国的总统选举，没有显示出通常在选举年对美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感到的紧张不安的任何迹象。这里的一些欧洲和美国的高级官员认为，当美国撇开世界只去注意选举时，西欧没有象通常那样惶惶然不知所措的基本原因有两个。

首先，大概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碰巧也是欧洲的一些大国全神贯注于国内政治的时期，或者即将举行选举，或者正在进行困难的国内政治谈判。

其次，西欧对于美国对世界其它地方所持的经久不变的立场已有了某种程度的信任，这种信任的程度由于一九七三年在美欧关系问题上发生争吵之后所培养的定期磋商的新习惯而大大加强了。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出现了比较满意的情绪，这是因为普遍一致地估计，苏联常规部队对欧洲的威胁在增加，其结果是，普遍都愿意行动起来加强防务。

今秋联盟的军事演习将比往常更加紧密配合和协调一致。据北约司令黑格将军说，演习的目的是要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改进西方随时应付俄国人已越来越有能力发动的突然袭击的能力。

防务预算已成为联盟内部关注的一大问题，这使得人们重又注意内政了。

对苏联军力加强的关注也使欧洲人更加谨慎地考虑缓和了，并把他们的防务预算看作是一个抵制出于政治考虑而进行削减的问题，而不是同美国发生争端的问题。

苏联未能履行同美国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的人权条款及其不断扩大军备的行动已使欧洲人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强大联盟的观念加强了。

当欧洲领导人注视美国竞选运动时，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曾担心的那种孤立主义潮流会席卷美国并怂恿苏联的冒险主义者。

同时，使那些决策人物全神贯注并支配他们的反应的仍是国内政治。

当前的一个例子是，法国对于国务卿基辛格阻挠向巴基斯坦出售法国设计的铀加工成套设备的尝试感到愤怒。

现在是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尖锐紧张关系快要表面化的时期。德斯坦总统和他的总理、戴

高乐派领袖希拉克之间有斗争。

人们援引希拉克的话说，总统的“所作所为象帝王一样”。而且，戴高乐分子长期以来就懂得，法国人可以在反对据认为是美国对他们独立的侵犯的号召下而动员起来。

基辛格扬言，如果巴基斯坦购买法国的成套设备就中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这给批评德斯坦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来使他感到左右为难，他们要求他严厉拒绝美国以此来证明他是献身于独立的。

与此类似的是，施密特总理在华盛顿所说的西方四个主要盟国已商定，如果意大利让共产党人进入政府的话就不帮助意大利的说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已不存在共产党人进入新政府的问题了，因此盟

里根对共和党纲领的外交政策提出修改意见

强调美不要为了实行缓和而使苏单方面受益

【路透社堪萨斯城八月十六日电】在这里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头一天里，里根今天对福特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一次新的进攻。

在对将于明天投票表决的共和党的总的对外政策声明的一项修改中，里根对目前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进行了明显

国的实际协议是向意大利提供援助，因为意大利人已作出有限的妥协，允许共产党人发挥更多的影响。

在其它地方，瑞典将于今年、荷兰将于明年举行困难的、很可能是势均力敌的选举。意大利刚刚结束了使得政治活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错综复杂的竞选运动。

英国还不能肯定卡拉汉首相是否能使工党保持团结并避免提前大选。

各国的不同，挑战在一些国家主要是来自右翼，而在另一些国家则主要来自左翼，关键取决于谁当权。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欧洲政府的地位是不确定的，这种状态使得政治家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内听众，即便他们的讲话看来是针对国外的。

西方领导人的精力都集中于政治。今年，不单是美国的政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各国政府也在主要料理自己的烂摊子。

的攻击。

这项二百字的声明就对外政策提出四点意见，它告诫说不要为了实行缓和而使莫斯科单方面受益，它还含蓄地谴责福特先生拒绝会见流亡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

这项修改意见还建议共和党决定奉行一项将排除秘密协议的对外政策。

法新社评论《爱琴海的紧张局势》

说希土之间可能重新出现武装对抗的危险

【法新社巴黎八月十五日电】题：爱琴海的紧张局势

黑帆又在爱琴海上飘浮了，在安卡拉政府的军队侵入和占领二分之一的塞浦路斯岛二年之后，今天这里重新出现了希腊和土耳其朝夕之间可能发生武装对抗的危险。

这一次，在土耳其和希腊的长期争吵的新阶段里，再也不是少数民族问题，也不是有争执的领土问题，而是石油问题。毋庸置疑，这对于这两个相当贫穷和没有自己能资源资源的国家来说是更加严重的，因为根据可能有丰富石油矿的大陆架归属于谁，大陆架就会给它们两国之间造成决定性的经济上的不平衡。

问题说起来简单，实际上是解决不了的。关键是要知道，作为领土海底延伸部分的大陆架，应该从土耳其海岸延伸呢，还是应从与它

相隔几千海里的希腊岛屿延伸。

希腊的理论自然希望这个大陆架是从诸如希俄斯、利姆诺斯、罗得岛延伸，因此希腊当局才对土耳其的“西斯米克号”石油勘探船（该船恰恰是去探测这些有希望的海底的）的使命发出了惊呼，以致于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控诉。

雅典认为，安卡拉赋予“西斯米克一号”船的使命是极其严重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以致它毫不犹豫地宣布了戒备状态，把装甲兵后备队派往同土耳其欧洲部分接壤的埃夫罗斯边境上，并动员了空军力量，以应付极其可能发生的冲突。

土耳其的论点是，爱琴海的大陆架并未划定界线，因此，土耳其船只进行勘察是不需要任何人授权的。

在这种可能变成对抗的争执背后，是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纠纷。希腊没有忘记在塞浦路斯受到的侮辱，土耳其感觉它的军队和经济一样，都是强大的，它的经济正在发展并渴望获得能源。它也知道，在美国在这个选举时期对东地中海局势不稳的新策源地感到厌恶而表现出的相对冷淡之时，苏联今后将向它提供政治上的支持。

对于苏联来说，卡拉曼利斯的希腊是“不可拉拢的”，而土耳其却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顾客”。这要在这两个历史上由无数流血的冲突所分离开的宿敌再次对立起来时，才是可能的。

对于美国来说，首先就是要避免大西洋联盟的两个成员打起来。对于整个联盟来说，打起来将证明是联盟的破产，而且基辛格强调说，这将是一个“悲剧”。

对待了这个“疯狂的荷兰人”（同事们开始都这样称呼他）的要求，就把他派到剑桥的俄国课工作。一九四八年春，布莱克顺利地学完了俄语课程，并能用俄语非常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就在那一年，布莱克被英国外交部录用，并被任命为英国驻朝鲜汉城的副领事。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发生的朝鲜战争事件，对布莱克来说并不感到意外，在档案卷里还保存着布莱克关于朝鲜战争不可避免要发生的情报。朝鲜共产党人很快占领了汉城。英国人没来得及撤退。乔治·布莱克被朝鲜共产党人抓住当了俘虏。他同其他一些俘虏，从汉城被送往平壤——北朝鲜首都。共产党人认为，留在汉城的布莱克是一个间谍。同年九月，布莱克同其他俘虏徒步被送往同中国交界的鸭绿江边。

十月九日，共产党人把俘虏带到鸭绿江边某地的新的收容所，这是一个很冷的日子，北风呼号，俘虏的押送者在军大衣外面，披上了防寒被子，布莱克就利用这个机会，悄悄地离开队伍逃跑了。他向南走了一宿，期望能碰上美国人。黎明前，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巡逻队，由于无力逃避，布莱克就向巡逻队大胆迎了上去。这都是些北朝鲜人，他们抓住了布莱克。（二）

《新俄罗斯言论报》文章

《一个效命克格勃的三面特务》

在地下活动中，乔治化名为马克斯·范·弗里耶斯。他由于勇敢和机智，很快就变得赫赫有名。德国人决定，要悬巨赏来换取他的脑袋。他们懂得，马克斯·范·弗里耶斯是一名非常危险的游击队员；但他们不知道，他只是个十八岁的人。然而，地下工作者司令部钻进了一个奸细，在一年中，秘密警察逮捕了五十四个游击队员中的五十人，德国人还抓住了几个从英国空运来的英国间谍。秘密警察的包围圈也在马克斯·范·弗里耶斯的周围收缩着。还是英国间谍蔡尔德挽救了他。蔡尔德在地下工作者那儿碰上了他，命令他跑往法国去，然后经西班牙回到英国，以避免必然遭到的逮捕。

“我们非常需要你，”他说，“而在这儿你会被捕，并牺牲在德国集中营里。”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个年轻的特拉普修士团修道士越过了荷兰和比利时的国界。边防军对他未引起任何注意，修道士所持的全部证件都是手续完备的：皮特法特受修道院长的召唤到布鲁塞尔去。不过，在去法国的路上，在里尔附近，一支德国巡逻队拦住了骑着自行车的修道士，尽管他证件俱全，他们还是认为他的形迹可疑。

“到司令部去弄清楚，”德国人说，“现在你上车，你的自行车也搬上去。”

幸而，发生了空袭。德国人对汽车和皮特法特师弃置不顾，躲进了森林。开始投弹，接着就是炸弹爆炸。皮特法特也跑进森林，是往另一方向跑的。而在那儿他又走了运：在森林守卫室里，他碰上了一个参加地下抗战组织的人，那个人把他藏了起来，躲过了德国人，第二天，又帮他来到了巴黎。一九四三年初，乔治经西班牙平安地到达了伦敦。在这里，他会见了一家人和他的救命恩人——蔡尔德。蔡尔德把他安排在海军舰队里做一名志愿兵。

上司由于了解到乔治的奇异经历，就把他送到海军情报机关的专门学校，在那儿，他出色地完成了学习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乔治是一个翻译，在蒙哥马利元帅的司令部服役。他二十二岁的时候，正式改姓，之后，他就叫乔治·布莱克。他调到了汉堡，在那儿，他审讯德国海军军官，主要的是潜水舰队的军官；同时，他也对苏联军人感到兴趣。然而，他懂得，为了在苏联军人中有成效地进行间谍活动，必须掌握俄语。他递了申请书，表示希望学会俄语。上司认真

菲律宾外长罗慕洛谈菲对外政策

说马科斯访华使菲摆脱孤立状态和狭隘观点

【美联社马尼拉八月十四日电】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今天说，菲律宾将帮助新统一的越南进行国内建设，帮助“医治残酷战争的创伤……我们准备同印度支那人民和平共处……”。

至于美国，罗慕洛说，菲律宾将“……寻找一个符合亚洲正在出现的现实情况的新基础，以便能有一种继续保持下去的健康关系……”。

他是在菲律宾中部巴科洛德市举行的一次实业界和民众团体领导人的会议上，回顾马科斯总统领导的已实行四年之久的军事管制之下菲律宾对外政策指导方针时说这番话的。

罗慕洛说，其他指导方针包括：“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加强我们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各成员国的关系。”

他还说，菲律宾还将“更积极地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罗慕洛说，早在一九六八年，当这个国家“仍然坚定地置身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自由世界国家集团之中”的时候，马科斯就开始“以长远而全面的眼光”对菲律宾的对外政策进行“研究”。

罗慕洛还说，“马科斯对北京进行的国事访问，使菲律宾人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决定性的引人注目的改变，并且使他们摆脱了他们自己造成的孤立状态和狭隘观点。因此在菲律宾的历史上，北京成了一个分水岭……”。

罗慕洛说：“中国……象征着同过去进行的第一次决定性的决裂，正如它象征着重建菲律宾同亚洲那一部分的古老关系的第一个行动一样。中国使菲律宾同日益独立和维护自己利益的第三世界的一致性显得更突出了。”

他说，“菲律宾同苏联建立关系的目的之一是确保东南亚国家联盟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团心目中的地位，因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目的之一是取得一个中立的地位，不仅是在东南亚的互相竞争的力量之间，而且是在全世界互相竞争的力量之间取得一个中立的地位”。

【本刊讯】澳大利亚《先驱报》八月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微笑》。《美国中央情报局说，我们是会完全答应的》，摘要如下：

弗雷泽向华盛顿的美国领导人作的一项保证比所有其他的接待排场、讲话和讨论的全部价值要大得多。

总理向美国人保证，他的政府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阻碍他们继续掌握他们的松峡的绝密基地。

因此，澳大利亚现在受到了欢迎，要它再次参加美国的绝密情报网。

除了松峡以外，华盛顿的美国人土对我说，对于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那些军事上有重要意义的其它基地——澳大利亚西北角的海军设施和和在纳朗格的防御和空间通讯站——和尚待建立的欧米加导航基地问题上，弗雷泽作了完全同样牢靠的保证。

但是，对美国真正重要的是松峡基地。

弗雷泽在华盛顿作的保证比过去长期从澳大利亚听到的任何消息都更加受到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欢迎。无论是美国的情报界还是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最高级官员，都关注松峡——它是美国在美国本土以外最重要的基地之一——的前途和澳美之间的情报关系的状况。

弗雷泽访美的一个结果是澳大利亚同美国的情报网建立了特殊关系，

日报报道

《最大限度地利利用“援助”来进行操纵，苏联的阴影笼罩着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会场》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八月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小林十四日发自科伦坡的消息，题为《最大限度地利利用“援助”来进行操纵，苏联的阴影笼罩着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会场》，摘要如下：

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外长会议已经形成了政治和经济两个宣言草案，但是，此间人士几乎一致认为，苏联把紧张缓和与民族解放巧妙地分开使用的路线最明显地反映在这些草案之中。从会议决定罗马尼亚、菲律宾、葡萄牙三

苏丹《新闻报》社论

《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

【本刊讯】苏丹《新闻报》八月十五日刊载一篇社论，题为《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摘要如下：

出席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的成员国，已组成世界上最大的政治集团，并成为一支越来越有影响力的经济力量。

最引人注目的是已经发生在不结盟集团内部的某些变化。它似乎比以前更难以回到不结盟集团团结一致的良好时代。不久前，阿拉伯

国只是在这次科伦坡会议上作为来宾参加这一点来看，似乎也可以说会议可能是按苏联的想法进行的。已内定三年后的第六次会议的主持国是苏联的友邦古巴，使人预感到苏联在第三世界的阴影将更加浓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不结盟国家对美国所进行的猛烈批判。接受苏联援助的国家以印度为首在会议中占绝对多数，他们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服从克里姆林宫的路线。

决定邀请罗马尼亚和菲律宾一律作为来宾参加，乍看起来似乎是

印度和南斯拉夫两派在逻辑上的妥协的产物，而实际上是力量对比的产物。在不结盟这个准结盟内部印度派取胜，这只不过是背后的苏联得益。

特别是印度和南斯拉夫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问题，是罗马尼亚作为不结盟国家参加会议的问题。如果象罗马尼亚申请的那样承认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只要得到会议主席的许可就可以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下次的哈瓦那会议就可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不结盟会议。如果罗马尼亚不结盟化，那就意味着苏联羽翼下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削弱，就

济和方面进行对话是可能的。国家还起到了不结盟集团团结的核心作用。然而现在，它们处于分裂的状况。由于不结盟集团过去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得到的传统援助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她应该依靠她自己的力量解决她的问题。原因是：两个大国正在寻求一项缓和的政策，虽然这项政策在一个方面是积极的，但是它有害于由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的利益。

可能使中苏在第三世界中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所以，苏联拼命加以阻止，通过印度和古巴，成功地把罗马尼亚降到有名无实的只作为本届来宾资格。

苏联的成功还不仅如此。在政治宣言中写进了缓和紧张局势一章，在这一章中，称赞欧安会，认为下一个目标是地中海和中东的缓和，仅仅没有使用亚安体系这个措词，但也谈到有必要把集体安全保障体制扩展到全世界。另一方面，确认了促进和加强非洲等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特别是明确地表明支援南非、纳米比亚等地的黑人斗争。许多人认为，这里也反映了从介入安哥拉以来，想向非洲扩大势力的苏联的意图。

南通社说加拿大对不结盟会议有很大兴趣

【南通社渥太华八月十二日电】加拿大外交官员正在对科伦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正象他们曾对尽可能多地了解这次重大的会议整个筹备情况表现出兴趣一样，此间对这次会议的估价首先是把它看作是——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次例行会议——的不结盟国家将在这次会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序曲。

关于科伦坡会议的议程本身，渥太华的安全和裁军问题以及所有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上，加拿大外交人士强调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把在联合国大会第七次特别会议上开始的，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继续下去并加以扩大，的愿望在科伦坡会议上是否将占上风。渥太华一贯认为在经

澳报报道

弗雷泽保证让美继续使用秘密基地

澳《时代报》报道《美向弗雷泽提出了“不要触怒雅加达”的告诫》

这对澳大利亚来说，也许比松峡协定越来越永久化更加重要。

澳大利亚现在是全然听从中央情报局，甚至更机密、更重要的国家安全机构和美国国防情报组织的意见了。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这对弗雷泽可能特别重要，因为众所周知，他是很关心印度洋的。

他在华盛顿所得到的情况简报表明：苏联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并没有减少；苏联海军经常利用新加坡和印度的港口；苏联正在印度洋西北角的索马里继续建立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美国人对他说，他们很关心，因而已开始（这是第一次）对印度洋进行经常的空中巡逻。

【本刊讯】澳大利亚《时代报》八月三日刊登该报驻新加坡记者写的一则消息，题为《在华盛顿的会谈中美国向弗雷泽提出了“不要触怒雅加达”的直率告诫》。《美国将保障它的潜水艇要通过的印度尼西亚海峡》，摘要如下：

美国已告诫澳大利亚不要因帝

汶问题使它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美国还告诫说，如果澳大利亚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恶化了，就可能妨碍美国要同苏联军事力量抗衡的战略。

这是美国驻东南亚的一些官员今天透露的。

他们认为，福特政府和五角大楼的一些高级成员是在上星期同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感到担忧的。

这些官员还透露，由“友好的反共”政府控制东帝汶对美国来说具有直接的战略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帝汶岛以北的不太出名的翁拜—韦塔尔深水海峡是美国核武装潜艇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最快并且是最安全的潜行通道。美国有四十一艘核动力舰队弹道导弹潜水艇，都装有北极星式或海神式核弹道导弹。这些潜艇是美国对付苏联的核打击和核威慑力量的关键部分。

据信，这是华盛顿的政府高级官员告诉弗雷泽和皮科克外长的。权威人士说，美国同苏哈托政

府已作了关于核动力舰队弹道导弹潜水艇在水下不受阻碍地通过印尼水域的满意安排。一条航线是通过龙目和望加锡海域。但是，理想的水路是通过马鲁古和班达海域以及不大使用的翁拜—韦塔尔海峡。

观察家们认为，美国政府之所以欣然默认印尼接管这个有争议的葡萄牙殖民地和欣然默认它粉碎左翼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的独立运动，其原因之一就是东帝汶的战略位置。

他们说，这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华盛顿建议澳大利亚停止其官方对雅加达在帝汶问题上的批评——特别是因为苏哈托总统已签署了把这块地方并为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十七个省的法案。

目前，俄国的核潜艇从苏联的远东基地出发利用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些潜艇在通过这个海峡时为了安全不得不浮出水面。有些苏联潜艇可能在探索的基础上已冒险在水下通过龙目和望加锡海峡。

苏联尽力争取印度尼西亚，它对并吞东帝汶提出的批评保持在最低限度之内。

尽管莫斯科并不象华盛顿那样迫切需要使它的核潜艇能不受阻碍地通过印度尼西亚水域，但是莫斯科的肯定的利益在于设法监视和切断美国的联络线路。

【本刊讯】苏联《文学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刊登亚历山大·列维科夫的一篇文章，题为《怎样成为部长》，摘要如下：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社会和国家中关于劳动人民参与管理生产的各种形式，关于工人代表在各级国家政权机关，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同经理、学者、部长、党的工作人员、农村使者、教师、文化活动家平起平坐，一道开会的情况，已有许多记载。

但是，从另一方面弄清楚工人个人的官运如何，他们在职位阶梯上能升多高，是很有趣的。

工作台、元帅、元帅杖

不管是开玩笑，还是一本正经，机器制造厂二十岁的钳工K·谢尔盖一心想当部长。嘿，即使当不成部长，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当一个大的企业领导人。

不要急于向他泼冷水，也许他在学校时就手不释卷地读过关于古比雪夫和捷沃西安、李哈乔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书籍吧？也许他从小就懂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是个坏兵？懂得每个士兵都在自己的行军背袋里带着元帅杖吧？

一个列兵复员了，也就谈不上当元帅了。但是，他能否把一根新的元帅杖（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放进自己工作台的抽屉里呢？

作家弗拉基米尔·康托罗维奇在《文学家的眼光》一书中，同意物理学家H·托尔斯泰教授的意见，后者就同反对“人人都应安分守己”的虚伪格言一样，同样反对关于“元帅杖”的格言。他指出，认为进入生活的青年公民的社会角色是命中注定的，这是与我们的制度敌对的一种想法，但是，拿破仑所说的关于“元帅杖”的名言，为什么对我们显得就不适用呢？“人们反复对青年人说，通向他所向往的职业的一切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实际上，除元帅的'和纯粹知识分子的职业外，这句格言贬低了所有职业，把选择生活中的位置'描绘得过分容易，从而使青年人迷失方向。”

可能，这种异议是有道理的。但是，比方说，莫斯科国营第一轴承厂和塔干罗格康拜因工厂的每个钳工都知道他们的厂长（一个叫A·格罗莫夫，另一个叫H·鲁台）本人就当过车工。那末，为什么不能反复对青年说，他们面前的一切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如果他身强力壮，聪明能干，精力充沛，并且有上进心，比如谢尔盖，那么他总是想在自己的工作台以外想象和谋求自己的前途的，对他来说，另选一个“生活中的位置”是否容易——这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

但是，部长们又从哪儿来的呢？

基本上是从副部长提升的。而副部长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主要是从经理中选拔的。

不久前，副部长兼陶里亚蒂汽车公司总经理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波利雅科夫被任命为汽车工业部长。而在此之前，他是干什么的呢？比方说，十年前他是干什么的呢？六十年代中期他领导过莫斯科市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这以前他当过这个委员会主席的“副手”。而更早些呢？他是一个小马力汽车工厂的厂长……。如果我们沿着使维·尼·波利雅科夫升至目前职务的阶梯往下走，那么在各级阶梯上我们将看到的是：总工程师、副总设计师、车间主任、车间副主任、实验室领导人、实习工程师、工长、技术员、钳工，最后是钳工学徒。我们同你们一道走到一九三〇年，当时他才十五岁，谁也不尊称他为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

请看苏联政府成员，现在领导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苏联各部部长第一个职业的原任职务表：榨油厂工人、自动工具调整工、设计工程师、钳工学徒、电报机机务员、机车司机助手、飞行员、钳工、工程师、热电站电工、木材厂细木工、又是钳工、值班化学技工、机械工、木工、工程师、科研院所主任工程师、技术员、电器工厂助理工、棉纺厂司机、电器安装工、绘图员、良种选育员、车工、又是钳工、粗工……。

有趣的是，二十世纪尖端部门的领导人，苏

苏联《文学报》
文 章

《怎样成为部长》

联电子工业部部长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绍金就是粗工出身。当然，很快他就已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钳工……”如果在西方有人有了象我们的部长一样的官职，那么，就会使一个商行作为广告宣传的流行口号增加说服力，即“当我们需要一个经理时，我们就雇用一杂工”。

“家庭”教育

现在，言归正传，在今天，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一个钳工能否成为……比如说，首先能否成为一个经理？

格罗莫夫、鲁台和他们的同龄人曾经都是工人。他们正碰上直接从工作台提拔钳工为经理的年代。

我兴致勃勃地翻阅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工业领导人的调查材料，其中一份材料，在一九二二年曾以《我们的工业指挥者》为题印发过。在一百五十九名企业经理和托辣斯管理委员会成员中，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教育程度很低，有的从未受过教育：“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人的地位完全有赖于十月革命，因此，他们的生产技术资格是成问题的，无论如何，他们资历不深。”据材料中说，就这些人的行政管理才能来说，评价不高。对八十名经理的专门补充调查表明，他们的这些品质只配打三分（按五级记分制）……“许多经理缺少最起码的知识，甚至父名都不知道。”

严重缺乏受过教育的领导者，曾经长期使我们感到苦恼。一九三〇年对六百四十六名经理的调查表明，他们当中只受过初等和“家庭”教育的人占一半以上。当时社会学家还对一批五百四十四名企业经理进行了调查，结果比前一批人更不如，只受过初等和“家庭”教育的人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三。

我不想重复众所周知的情况，不去谈国家为培养自己的专家和领导人作了多大的工作，即在各城市和乡村迅速建立高等学校与高等技术学校的情况，还有“红色经理”训练班和学院以及工业学院的情况。也不讲破格提升的人中只有那些彻夜不眠、勤奋学习的人，才能在职务阶梯上上升得比经理更高。我只讲一点，即破格提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还有老粗出身的经理，但是现在谁也不会把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至少没有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人任命为企业的新领导人。

这就是我们的想当部长的钳工所面临的问题。……

并列行进和循序渐进

在通向经理交椅的道路上，他一迈步就要与青年专家进行激烈的竞争。正如列宁格勒的社会学家所证明的那样，青年专家在厂内向领导职务前进的速度比那些只具有中学毕业文凭的人快一倍。

当然，可以参加函授学习，但是，时间呀时间……。他从部队复员已经二十一岁……当获得高校毕业证书时，你就会看到专家们已干了三、四年工长和班长了，已开始向车间主任前进，有的人甚至向更高处前进。看来，他们的成长比读函授的钳工快得多。职务升迁的速度具有决定意义。你慢了一步，火车就开走了。

然而大多数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入高等学校。他们的出路就是参加生产。这是一条光荣的、适当的、国家需要的道路，我们这样说也是对的。怎么搞的，结果是，我们把孩子们引上了一条不能通往“高级地位”的道路吗？这是一条社会死胡同，是这样吗？

不，不是这样。

乍一看，和年轻的工程师相比，一个钳工的机会实在不大……但你们看到了“带有集电弓的飞机”：工程师们竟不想成为生产的领导人！他们当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愿意当工长，然后当车间主任。学者们通过在各个不同的城市进行大量调查证明了这一点。高等学校毕业生显然宁愿从事

设计、工艺和科研工作。你用小圆面包不能把他们诱入车间。为什么不去——这是个特殊问题，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

我还可以提醒大家，在学院里从一个年级升到另一个年级和在生产中从一个台阶升到另一个台阶，不是循序渐进，而是并列行进。列宁格勒的社会学家指出，教育的发展推动了职务的升迁，而职务高升又给教育以促进。

对不起，你们有权问我，既然管理职务原则上指定工程师担任，那么，你们的谢尔盖不是凭别人的车票坐车吗？假使专家们不打算离开车间的领导岗位呢？假使明天提高了这些管理职务的威望，对这些职位规定了更诱人的薪额呢？那时怎么办？我的回答是，那时教育和升迁的统一不会象现在这样是并列行进的，而是循序渐进的。人们会对函授生说：首先你们要学习好。如果工程师够了，谁还需要把低年级大学生放到领导岗位上去呢？“这就是说，你断言，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一个十年制中学毕业的青年工人……”

建立管理学校吗？

那末，今天青年工人究竟能否坐上经理的交椅呢？是否有这样的例子呢？

请看近两年被任命的一些人吧：明斯克电机厂经理A·E·谢姆钦科最初是个装配工；亚罗斯拉夫发电机制造厂经理O·K·季亚科诺夫最初是个杂工；经理……。其实，不是还可举出一个名字吗？

说起来，无论是谢姆钦科，还是季亚科诺夫，都有高等学校毕业文凭。这么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也可以从钳工、杂工开始做起吗？然而，不管哪种例子都不难找。大多数年轻的合乎现代水平的经理，新一代的领导人一开始从事生产工作就是工程师。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趋势是自然的，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至于说到工业、建筑业、运输业……，特别是近年来，领导工作的主要人选是专家，通常是工程师或技术员。”

我国知识分子与人民血肉相联，这是个定理。但是，照我看来，直接“从车床旁”把人们提到领导岗位的社会提拔，决不是一个过时的课题。我认为，年复一年，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尖锐和迫切。因此，应当为这一过程寻找现代化的形式，因为模仿三十年代的选拔制度已为科学技术所禁止，而依靠放任自流和“自然淘汰”又是我国社会的社会目标所不允许的。

我认为，就象对工程师候选人一样，对受过专门管理教育的工人候选人，也应开放通往领导职务的道路，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这样一来，许多钳工、车工、锻工、炼钢工、安装工，就象现在这样，进入函授和函授大学，补充各种专业工程师的队伍，补充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人队伍，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是对那些仍将留在车床、压床、高炉、自动线，组装传送带和起重机旁的人来说，为了使他们成为生产领导人和沿着管理职务的阶梯晋升，同样可以而且必须减少他们路上的阻力，为他们创造条件。考虑到，工人中中学毕业的青年人逐年增多，而函授教育体系是容量有限的。

我们是否应当考虑在国内建立直接从工人中培养各生产环节的职业领导人的管理学校网呢？这样，好些问题很快就可得到解决。可以获得干练的常备的行政管理人员，这是工业部门迫切需要的。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工人职业的地位。在社会领域中，可以为进入工厂的十年制中学毕业生开辟新的前景。

这种学校可按目前中等技术学校的方法实施中等专业教育，不过所教知识“内容”不同，不是工艺知识，而是管理知识。而以后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把这种学校最合格和最有天资的毕业生保送到高等专业学校。这样车工和钳工们就可通过“培养组织者的技校”去接受高等管理教育，这就像提琴手和钢琴手通过音乐学院升入音乐学院一样。

到那时K·谢尔盖就可“凭自己的车票坐车”了，而现在“列车长”正急急忙忙在站台上跑来跑去，试图把车票塞给那些不打算坐车的人。

【本刊讯】苏联《文学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刊登亚历山大·列维科夫的一篇文章，题为《怎样成为部长》，摘要如下：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社会和国家中关于劳动人民参与管理生产的各种形式，关于工人代表在各级国家政权机关，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同经理、学者、部长、党的工作人员、农村使者、教师、文化活动家平起平坐，一道开会的情况，已有许多记载。

但是，从另一方面弄清楚工人个人的官运如何，他们在职位阶梯上能升多高，是很有趣的。

工作台、元帅、元帅杖

不管是开玩笑，还是一本正经，机器制造厂二十岁的钳工K·谢尔盖一心想当部长。嘿，即使当不成部长，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当一个大的企业领导人。

不要急于向他泼冷水，也许他在学校时就手不释卷地读过关于古比雪夫和捷沃西安、李哈乔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书籍吧？也许他从小就懂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是个坏兵？懂得每个士兵都在自己的行军背袋里带着元帅杖吧？

一个列兵复员了，也就谈不上当元帅了。但是，他能否把一根新的元帅杖（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放进自己工作台的抽屉里呢？

作家弗拉基米尔·康托罗维奇在《文学家的眼光》一书中，同意物理学家H·托尔斯泰教授的意见，后者就同反对“人人都应安分守己”的虚伪格言一样，同样反对关于“元帅杖”的格言。他指出，认为进入生活的青年公民的社会角色是命中注定的，这是与我们的制度敌对的一种想法，但是，拿破仑所说的关于“元帅杖”的名言，为什么对我们显得就不适用呢？“人们反复对青年人说，通向他所向往的职业的一切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实际上，除元帅的'和纯粹知识分子的职业外，这句格言贬低了所有职业，把选择生活中的位置'描绘得过分容易，从而使青年人迷失方向。”

可能，这种异议是有道理的。但是，比方说，莫斯科国营第一轴承厂和塔干罗格康拜因工厂的每个钳工都知道他们的厂长（一个叫A·格罗莫夫，另一个叫H·鲁台）本人就当过车工。那末，为什么不能反复对青年说，他们面前的一切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如果他身强力壮，聪明能干，精力充沛，并且有上进心，比如谢尔盖，那么他总是想在自己的工作台以外想象和谋求自己的前途的，对他来说，另选一个“生活中的位置”是否容易——这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

但是，部长们又从哪儿来的呢？

基本上是从副部长提升的。而副部长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主要是从经理中选拔的。

不久前，副部长兼陶里亚蒂汽车公司总经理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波利雅科夫被任命为汽车工业部长。而在此之前，他是干什么的呢？比方说，十年前他是干什么的呢？六十年代中期他领导过莫斯科市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这以前他当过这个委员会主席的“副手”。而更早些呢？他是一个小马力汽车工厂的厂长……。如果我们沿着使维·尼·波利雅科夫升至目前职务的阶梯往下走，那么在各级阶梯上我们将看到的是：总工程师、副总设计师、车间主任、车间副主任、实验室领导人、实习工程师、工长、技术员、钳工，最后是钳工学徒。我们同你们一道走到一九三〇年，当时他才十五岁，谁也不尊称他为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

请看苏联政府成员，现在领导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苏联各部部长第一个职业的原职务表：榨油厂工人、自动工具调整工、设计工程师、钳工学徒、电报机机务员、机车司机助手、飞行员、钳工、工程师、热电站电工、木材厂细木工、又是钳工、值班化学技工、机械工、木工、工程师、科研院所主任工程师、技术员、电器工厂助理工、棉纺厂司机、电器安装工、绘图员、良种选育员、车工、又是钳工、粗工……。

有趣的是，二十世纪尖端部门的领导人，苏

苏联《文学报》
文 章

《怎样成为部长》

联电子工业部部长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绍金就是粗工出身。当然，很快他就已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钳工……”如果在西方有人有了象我们的部长一样的官职，那么，就会使一个商行作为广告宣扬的流行口号增加说服力，即“当我们需要一个经理时，我们就雇用一杂工”。

“家庭”教育

现在，言归正传，在今天，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一个钳工能否成为……比如说，首先能否成为一个经理？

格罗莫夫、鲁台和他们的同龄人曾经都是工人。他们正碰上直接从工作台提拔钳工为经理的年代。

我兴致勃勃地翻阅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工业领导人的调查材料，其中一份材料，在一九二二年曾以《我们的工业指挥者》为题印发过。在一百五十九名企业经理和托辣斯管理委员会成员中，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教育程度很低，有的从未受过教育：“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人的地位完全有赖于十月革命，因此，他们的生产技术资格是成问题的，无论如何，他们资历不深。”据材料中说，就这些人的行政管理才能来说，评价不高。对八十名经理的专门补充调查表明，他们的这些品质只配打三分（按五级记分制）……“许多经理缺少最起码的知识，甚至父名都不知道。”

严重缺乏受过教育的领导者，曾经长期使我们感到苦恼。一九三〇年对六百四十六名经理的调查表明，他们当中只受过初等和“家庭”教育的人占一半以上。当时社会学家还对一批五百四十四名企业经理进行了调查，结果比前一批人更不如，只受过初等和“家庭”教育的人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三。

我不想重复众所周知的情况，不去谈国家为培养自己的专家和领导人作了多大的工作，即在各城市和乡村迅速建立高等学校与高等技术学校的情况，还有“红色经理”训练班和学院以及工业学院的情况。也不讲破格提升的人中只有那些彻夜不眠、勤奋学习的人，才能在职务阶梯上上升得比经理更高。我只讲一点，即破格提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还有老粗出身的经理，但是现在谁也不会把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至少没有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人任命为企业的新领导人。

这就是我们的想当部长的钳工所面临的问题。……

并列行进和循序渐进

在通向经理交椅的道路上，他一迈步就要与青年专家进行激烈的竞争。正如列宁格勒的社会学家所证明的那样，青年专家在厂内向领导职务前进的速度比那些只具有中学毕业文凭的人快一倍。

当然，可以参加函授学习，但是，时间呀时间……。他从部队复员已经二十一岁……当获得高校毕业证书时，你就会看到专家们已干了三、四年工长和班长了，已开始向车间主任前进，有的人甚至向更高处前进。看来，他们的成长比读函授的钳工快得多。职务升迁的速度具有决定意义。你慢了一步，火车就开走了。

然而大多数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入高等学校。他们的出路就是参加生产。这是一条光荣的、适当的、国家需要的道路，我们这样说也是对的。怎么搞的，结果是，我们把孩子们引上了一条不能通往“高级地位”的道路吗？这是一条社会死胡同，是这样吗？

不，不是这样。

乍一看，和年轻的工程师相比，一个钳工的机会实在不大……但你们看到了“带有集电弓的飞机”：工程师们竟不想成为生产的领导人！他们当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愿意当工长，然后当车间主任。学者们通过在各个不同的城市进行大量调查证明了这一点。高等学校毕业生显然宁愿从事

设计、工艺和科研工作。你用小圆面包不能把他们诱入车间。为什么不去——这是个特殊问题，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

我还可以提醒大家，在学院里从一个年级升到另一个年级和在生产中从一个台阶升到另一个台阶，不是循序渐进，而是并列行进。列宁格勒的社会学家指出，教育的发展推动了职务的升迁，而职务高升又给教育以促进。

对不起，你们有权问我，既然管理职务原则上指定工程师担任，那么，你们的谢尔盖不是凭别人的车票坐车吗？假使专家们不打算离开车间的领导岗位呢？假使明天提高了这些管理职务的威望，对这些职位规定了更诱人的薪额呢？那时怎么办？我的回答是，那时教育和升迁的统一不会象现在这样是并列行进的，而是循序渐进的。人们会对函授生说：首先你们要学习好。如果工程师够了，谁还需要把低年级大学生放到领导岗位上去呢？“这就是说，你断言，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一个十年制中学毕业的青年工人……”

建立管理学校吗？

那末，今天青年工人究竟能否坐上经理的交椅呢？是否有这样的例子呢？

请看近两年被任命的一些人吧：明斯克电机厂经理A·E·谢姆钦科最初是个装配工；亚罗斯拉夫发电机制造厂经理O·K·季亚科诺夫最初是个杂工；经理……。其实，不是还可举出一个名字吗？

说起来，无论是谢姆钦科，还是季亚科诺夫，都有高等学校毕业文凭。这么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也可以从钳工、杂工开始做起吗？然而，不管哪种例子都不难找。大多数年轻的合乎现代水平的经理，新一代的领导人一开始从事生产工作就是工程师。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趋势是自然的，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至于说到工业、建筑业、运输业……，特别是近年来，领导工作的主要人选是专家，通常是工程师或技术员。”

我国知识分子与人民血肉相联，这是个定理。但是，照我看来，直接“从车床旁”把人们提到领导岗位的社会提拔，决不是一个过时的课题。我认为，年复一年，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尖锐和迫切。因此，应当为这一过程寻找现代化的形式，因为模仿三十年代选拔制度已为科学技术所禁止，而依靠放任自流和“自然淘汰”又是我国社会的社会目标所不允许的。

我认为，就象对工程师候选人一样，对受过专门管理教育的工人候选人，也应开放通往领导职务的道路，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这样一来，许多钳工、车工、锻工、炼钢工、安装工，就象现在这样，进入函授和函授大学，补充各种专业工程师的队伍，补充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人队伍，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是对那些仍将留在车床、压床、高炉、自动线，组装传送带和起重机旁的人来说，为了使他们成为生产领导人和沿着管理职务的阶梯晋升，同样可以而且必须减少他们路上的阻力，为他们创造条件。考虑到，工人中中学毕业的青年人逐年增多，而函授教育体系是容量有限的。

我们是否应当考虑在国内建立直接从工人中培养各生产环节的职业领导人的管理学校网呢？这样，好些问题很快就可得到解决。可以获得干练的常备的行政管理人员，这是工业部门迫切需要的。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工人职业的地位。在社会领域中，可以为进入工厂的十年制中学毕业生开辟新的前景。

这种学校可按目前中等技术学校的方法实施中等专业教育，不过所教知识“内容”不同，不是工艺知识，而是管理知识。而以后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把这种学校最合格和最有天资的毕业生保送到高等专业学校。这样车工和钳工们就可通过“培养组织者的技校”去接受高等管理教育，这就像提琴手和钢琴手通过音乐学院升入音乐学院一样。

到那时K·谢尔盖就可“凭自己的车票坐车”了，而现在“列车长”正急急忙忙在站台上跑来跑去，试图把车票塞给那些不打算坐车的人。